

## 蜀刻唐人集之《张文昌文集》

《张文昌文集》，宋刻本。作者张籍（约767—830），字文昌，《新唐书》作和州乌江（今安徽和县）人，宋汤中《张司业诗集序》考订为吴郡（江苏吴县）人。贞元十五年（799）登进士第，韩愈荐为国子博士，终国子司业，世称张司业。籍性介直，当时朝野名士皆与之游。为诗长于乐府，颇有警句，与白居易、孟郊相酬唱。

张籍诗集见于著录的有：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四“《张籍诗集》七卷”。《郡斋读书志》“《张籍诗集》五卷”。《直斋书录解題》著录三则，一曰“《张籍集》三卷，唐国子司业张籍文昌撰，川本作五卷”。一曰“《木铎集》十二卷，张洎所编。钱公辅名《木铎集》，与他本相出入，亦有他本所无者”。一曰“《张司业集》八卷《附录》一卷，汤中季庸以诸本校定”。清黄丕烈曾以八卷本与所藏三卷本影钞宋本相校，“知八卷为胜”。清陆贻典云：“宋刻张司业集有二，一本八卷，一本上中下三卷，……闻此外尚有《木铎集》，惜无从一见之也。”（黄丕烈《尧圃藏书题识》）此宋蜀刻本，历代无明确著录。

今校以黄丕烈三卷本，二者分卷虽异，而其诗篇目及编次皆相同。惟此本目录有《酬裴仆射朝迴寄韩吏部》一首而卷内遗缺；另一首《酬浙东元尚书见寄绫素》在三卷钞本中无。三卷钞本计收诗380首，比此本多70首，近乎一卷之数。盖此本与三卷本同一源流，即“张籍集三卷……

川本作五卷”者。此本框高19.5厘米，宽13.5厘米，半叶十二行，行二十一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版心不记字数刊工，避宋讳“殷”、“敬”等字。卷首钤“翰林国史院官书”朱文长印、“刘体仁印”、“颍川刘考功藏书印”、“郇斋”、“祁阳陈澄中藏书印”。元代官藏印记，肯定了宋刻川本价值。此传本自明末由宫中属归刘体仁家藏。清末，据傅增湘《宋蜀本司空表圣文集跋》称：此文集散失不久，“厂肆于估得之山东，……其后六唐人集为友人朱翼庵所得，……昨朱氏书出，……其张（文昌）、李、郑、孙四集咸为同学邢君赞庭购之。”至民国年间，“郇斋”主人陈澄中获书携至香港，于建国初转藏我馆。

张籍为唐代著名诗人，其诗作盛传一时，前人曾誉川本为秘籍，今得以影印流通，是为古籍利用之一成绩。

（傅敏《蜀刻唐人集》出版前言）



张文昌文集八卷（唐）张籍撰 宋刻本。框高20.1厘米，宽14.5厘米。每半叶十二行，行二十一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存四卷（1-4）。

张籍（约766—830）字文昌，《新唐书》本传作和州乌江（今安徽和县）人，盖误；宋汤中《张司业诗集序》考订其为吴郡（今苏州）人，盖是。但张籍确曾移家和州乌江镇，与和州有千丝万缕联系。唐德宗贞元十五年（799）擢进士第，韩愈荐为国子博士，终国子司业，故世称“张司业”。籍以乐府名噪一时，其骨体实出王建上，后人概称“张王”。籍性耿介，当时朝野名士皆与之游，更与白居易、孟郊相酬唱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提要说张籍的文章只在《文苑英华》中载有两封给韩愈的信，余不概见。但就这两篇文章，“相其笔力，亦在李翱、皇甫湜间，视李观、欧阳詹之有意铲雕，亦为胜之”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·张司业集》提要谓：“其《集》为张洎所编。洎《集》称：‘自丙午至乙丑，相次缀辑，得四百余篇。’考丙午，为南唐李昇升元元年，当晋开运三年；乙丑，为乾德二年，盖洎搜葺二十年始成完本，亦云勤矣。”这段考证的思路很妥帖，但考证的年份很不确切。丙午不是南唐李昇升元元年，而应是南唐李璟保大四年，也就是后晋开运三年（946）；乙丑是北宋太祖乾德三年（965），而不是二年，二年是甲子，不是乙丑。从开运三年至乾德三年，恰好是二十年。四库馆臣说张洎为编辑唐张籍文集，花去二十年的功夫，搜葺始成，其说不误。张洎（933—996）字师黯，一字偕仁，滁州全椒（今属安徽）人。五代南唐时进士，后擢知制诰，迁中书舍人，参与机务，恩宠第一。入宋累迁中书舍人、翰林学士。至道元年（995）除给事中、参知政事，与寇准同列。其人博涉经史，多知典故，文采清丽。由这样一个人用二十年时间搜集、编辑张籍的文集，应该是可以信赖的一个传本，也应该是入宋以后各种传本的蓝本。当然，张籍诗的结集在唐代已经出现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所著录的《张籍诗集》七卷就是例证。《郡斋读书志》卷十七著录《张籍诗集》五卷，并谓：“其《集》五卷，张洎为之编次。”可证到晁公武编《郡斋读书志》时所见到的本子，就已是张洎编次，但是五卷的規制。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十九著录《张籍集》三卷，并谓“川本作五卷。”与《郡斋》所录卷数相符。又著录《木铎集》十二卷，谓：“张洎所编，钱公辅名《木铎集》，与他本相出入，亦有他本所无者。”又著录《张司业集》八卷《附录》一卷，并谓：“汤中季庸以诸本校定，且考订其为吴郡人。魏峻叔高刻之平江。续又得《木铎集》，凡他本所无者，皆附其末。”看来，自唐迄宋，张文昌的集子有三卷本、五卷本、七卷本、八卷本，八卷附录一卷本、十二卷本先后流传。其实大概只是卷帙分合的不同，内容并无明显的增损。然这些传本，今均已失传，只剩下八卷本的蜀刻本，还有一个《张司业诗集》八卷《附录》一卷的清初影宋抄本存世。从名称上看，清初影宋抄本的底本，当属魏峻平江刻本系统。魏峻，《吴郡志》卷十一有记载，他曾历官太社令、军器监簿，淳熙七年（1180）权兵部侍郎，累迁兵部尚书，致仕。看来他确与平江有关，平江即是吴郡。陈振孙说他在平江刻过《张司业集》八卷《附录》一卷，可信。这个本子是汤中汤季庸校定的。应是南宋初期刻本。现在我们据以影印的这个底本，是宋蜀刻唐人文集本。

传世宋蜀刻唐人文集有两个系统：一为十一行本，约刻于南北宋之际，今存骆宾王、李太

白、王摩诘，日本尚藏一种，凡四集；一为十二行本，约刻于南宋中叶，今存世者尚有十九种，其中就包括八卷本的《张文昌文集》。十二行本蜀刻唐人文集，书中光宗赵惇御名“惇”字及嫌名“敦”字皆缺笔避讳，表明其刻已届南宋中叶。勘核现存这个系统的蜀刻唐人文集，其版式行款、字体风格、印纸墨色如出一辙，因疑其为断代总集丛刻之散出者。据程有庆考证，宋王楙《野客丛书》卷五，出现了《唐六十家诗集》一名，但未说明由谁在什么地方出版。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·王右丞集》提要亦称：“建昌本与蜀本次序皆不同，大抵蜀刻《唐六十家集》多异于他处本。”王楙生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（1151），卒于南宋宁宗嘉定六年（1213），福州福清人，所著《野客丛书》分门类聚，钩隐抉微，考证经史百家，下至骚人墨客，佚草佚事，细大不捐。所记《唐六十家诗集》，在他下世前十七、八年已经行世，当为亲眼所见。陈振孙晚他三四十年，但是著名的目录学家，其所谓“蜀刻《唐六十家集》多异于他处本”之说，绝非无稽之谈。这就证明南宋中叶四川眉山地区的确刻过一部《唐六十家集》。直到明代杨士奇等核编的《文渊阁书目》，其卷十仍著录两部残宋本《唐六十家诗》，说明历史上确曾有过《唐六十家集》丛刻行世。这个问题一解决，现存宋蜀刻十二行本系统唐人文集的版本问题便迎刃而解了。此本《张文昌文集》便是其中的一种。因此，此本亦可定为“南宋中叶四川眉山地区刻唐六十家集本”。此本现存虽只有四卷，但它是张集现存最早的刻本，是宋时旧第，不失其文物价值和版本价值。

此本钤有“翰林国史院官书”、“刘体仁印”、“颍川榴考功藏书印”、“郇斋”、“祁阳陈澄中藏书印”等印记。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（李致忠《中华再造善本提要》）